



张曦 虞若愚 等著

移动的羌族

——应用人类学视角下的直台村与文昌村



学苑出版社

西部中国
民族学文库

张曦
虞若愚 等著

移动的羌族

——应用人类学视角下的直台村与文昌村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动的羌族：应用人类学视角下的直台村与文昌村 /
张曦等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77-4192-6

I．①移… II．①张… III．①羌族—移民安置—研究
—四川省 IV．①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3975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何纯谱

装帧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19.5

字 数：297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序一

本丛书以“西部中国民族学文库”命名,基于两个核心概念,即“西部中国”与“中国民族学”。

前者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地理区域,也往往包含着经济上的落差与文化上的差异。尽管我们都清楚,西部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立国的周秦汉唐至今令人自豪。公元10世纪以前,位于今中国西部的陕西和陇东曾长期是中国政治军事的核心地区,中国文明通过西部走向世界,西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但,历史充满跌宕起伏,今天中国的版图中,东部和西部,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地区性的,但由于中国民族的分布格局中,少数民族多集中在西部。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所界定的范围,与传统概念中的“西部”有一定的出入,不仅五个民族自治区均在其中,而且还囊括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及湖北省恩施、湖南省湘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就加重了西部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色彩。

由此引入第二个核心概念,即“中国民族学”。在中国,民族学是一个舶来的学科,但在其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一代代学者将西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研究中,创造出中国民族学的学科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中国各民族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这个特点在民族学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学者就开展了对于彝族、苗族、赫哲族、畲族、拉祜族、瓦族、傣族、羌族、藏族、瑶族、黎族及汉族的田野调查研究,其成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畬民的图腾崇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滇西边区考察记》及《江村经济》、《金翼》、《一个中国村庄:山东抬头》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和边疆危机,加之当时许多高校转移到西部,促使民族学学者进一步将研究视角投

向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关于中国民族学重视少数民族研究这一特点，有学者从该学科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其早期主要以“异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定位来进行分析。事实上，民族学注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关注人群、人性及其群体的文化变迁、适应及对外交流的研究内容，注重文化比较并从中总结规律、经验以求人类文化互相借鉴、互相欣赏、互相学习的学术理念等，都使这一学科在中国极具应用性和推广价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宣传口号，而是各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荣辱与共的结果。各民族共创中华，共同维系国家的统一与发展。而国家的强大，则是各民族安居乐业、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老一辈民族学家马长寿在上世纪40年代所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一文中，在谈到“几种人类学的原则可为吾国边政之用”中，将“人类唯一，文明则殊”列为第一条，正是基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事实。¹这种社会现实，为民族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发展的土壤。我们回顾中国民族学史，可以看到其发展的几次高潮，都与中国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一次是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国难当头、边疆危机促使中国民族学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以民族、边政研究的丰硕成果，推动了民族学本土化、民族学中国社会研究的历程。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语境中，民族学家满怀热情，投身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中。由于得到国家框架内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这一时期民族学家的社会参与是空前的，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发挥的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达到了迄今仍无法超越的辉煌。但这一时期的民族学明显出现偏差，在向苏维埃学派一边倒的过程中，完全切断了与西方学界的关系。第三次高潮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参与。特别是发展中所出现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加之冷战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带来的冲击，为民族学提出许多新的课题。民族学界在这个过程中抓住机遇，大显身手，积极参

1 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载《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2期。

与到中国民族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特别是2004年，两位中国民族学界领军人物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授民族关系问题，中国最高领导人强调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这一切，都为民族学的更快发展提供了好的契机。

总之，民族学在中国化过程中服务于社会的政治取向，特别是注重少数民族研究的特点，使得一些人在解读这门学科时，将其看成是单纯的实用性很强的“民族研究”而缺乏学科特色。甚至在研究者队伍中，有人认为人类学是研究汉族的，民族学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并强调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区别是前者重应用，后者则承继、发扬学理。人类学民族学的不可分割性是一个勿需讨论的话题，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既研究汉族，也研究少数民族的事实也是不容抹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社会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闭关锁国”，所以民族学这一源于国外的学科一度与西方社会“绝缘”。虽然苏联民族学在中国曾经昙花一现，但很快也在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和“修正主义民族学”的风潮中逐渐淡出，民族学只能在民族问题研究的名义下得以生存。如今，政治的封锁线早已打破，我们再没有必要自设壁垒，画地为牢。中国各民族社会文化都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由于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几千年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如果有意识地将“汉族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剥离开来，既很难全面理解少数民族文化，也很难理解汉族文化。在中国，自称人类学家者并没有忽略少数民族，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在研究队伍上的重叠性更是不能否认的。目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界最活跃的联谊平台“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正是沿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规则，两个概念并用。事实上无论冠以民族学还是人类学，都不是被中国大众所熟知的概念或领域，相对比较边缘，真正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并不是很多。虽然目前有许多领域（如各类交叉学科）或学者动辄使用“人类学”，但其研究也许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视角或方法，对学科内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这种现象好的一面是向更多人推广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理念，因为这门学科本身的开放性就极强。但另一方面，用的太多，无所不包，学科的底线和规范

就减弱了。所以民族学人类学在以其学以致用实证研究增加其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不要忽略学理上的支撑，需要在实证研究中体现学科原则与规范。

从中国民族学发展史看，第一代中国民族学学者在国外接触、学习了这门学科并将之在中国传播。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模仿、研读和吸收，而是提出了学科的“本土化”，就是要有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探索。然而这种“本土化”建立在吸收、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基础上，提倡在中国的“田野”中进行学科理论的“验证”。民族学产生于实地研究的不同“个案”，民族学家希望以一个个的“小社会”，找出对人类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但由于人类社会过于复杂，所以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其视野很重要。其中所包含的他者的理念、比较的眼光，对于我们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我们确实在几十年的时段里，几乎中断了与国外学界的联系，所以我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学科理论，与西方学界拉开了距离，出现了对话上的障碍。改革开放后，在学科重建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缩短这种距离。打开国门，我们发现世界变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如同 20 世纪初期一样，新一代学者也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潮流中走向国外学习民族学人类学。如果说中国第一代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学成归来后所承载的更多的是改造社会的责任感，那么新一代学者或许更多担负的是学科发展的重任。他们留学海外，并将所学到的学科理论付诸中国田野。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民族学人类学学子，无论留学何国，或是接受何种学科派别，但多数人是回到中国做田野。这个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老一代学者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子。2011 年，在全国首届民族学博士论坛上，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就讲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1961 年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人类学时，就拒绝按惯例做中国研究，而是几经周折，最后实现在美国研究印第安人的愿望。在这次演讲的讨论阶段，主持人良警宇就这种现象请教乔健先生。良教授说她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时，发现大陆和台湾学生要拿人类学的博士，一定要回到大陆或台湾做田野。但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白人学生则要到国外去做“异文化”研究，由此形成一种很有趣的“体制”。乔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出于制度上的不公平，多少有些种族偏见，即对方认为中国人英语不行，最好回到中国去，研

究“异文化”是开玩笑的。

也许正是在“海外留学”与“中国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学者在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田野实践里，感受到学科理论研究在中国的滞后，一些在西方遭受质疑或反思的理论及方法仍然被我们一成不变地奉为经典沿用。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引进、译介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中国研究中，为学科的发展、学科交流平台的搭建做出了贡献。当然这个平台是搭建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已经走过一段不平常的道路的基础上。即与上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学初期引进时期不同，经过近百年，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中国的民族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本土特点的研究成果，这批成果主要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

本书即承袭了中国民族学传统，将目光投向中国西部多民族地区——民族走廊。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系中，三个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藏羌彝走廊、南岭走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其历史反映了各民族的迁徙、流动和交融，其中不乏战争、矛盾与纷争，但更多折射的是各民族互通有无、相濡以沫的文化积淀。加强西部民族走廊研究，特别是对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及对当今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从社会层面上符合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学术层面上符合民族学学科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科理念，从单位层面上符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关注边疆与民族地区，特别是关注少数民族研究的一贯宗旨。

本书作者张曦多年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带领学生进入西部进行田野考察。本书的其他几位作者正是这些到西部参加田野实践的学生。读书（教学）、研讨与社会实践的三位一体，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多年秉承的传统，我们称之为“实践型研究型”教学模式。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承上启下的过程，由此，实现了民族学的薪火相承。本书的出版正是体现了“实践型研究型”教学的成果。

丁宏

2012年7月26日

序二

见微知著：汶川地震灾区羌族移民村落研究的意义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为此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达标，包括这两个范畴里的大规模双向流动人口的安置和治理。古代中国讲究安居乐业安土重迁，曾经视人口流动为动乱之源并称其为流民、游民或流浪之人。古汉字“民”亦通“氓”，流民与流氓意思相近。内地百姓也多把流动迁徙视为背井离乡的悲摧之事。

不过，理论的色彩毕竟不如生活之树鲜活。古代百姓在铭记杜甫的《三吏》《三别》之苦，但也信着“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因而在晚清时，也“闯关东”，也“走西口”，也“下南洋”。今日中国的幅员、民族和历史，都有人口流动之功。古代国家也曾动迁军人和百姓到边疆去“移民实边”或“屯垦戍边”，结果显示北南两“边”的文化生态也有差异。历代中原王朝没少往北边草原绿洲屯军屯民。但时间一长，这些人就没了踪迹，想来都同化于当地各民族。例如今天在西“边”和北“边”讨生活的汉人，能把各自在当地的家史追溯到明清以前。相比之下，南方汉人移民即使是“商屯”或逃难，但凡有些规模，就不仅能在当地“存亡绝续”和“克绍其裘”，而且能自称汉人正统或皇亲国戚。例如华南因而就有三国两晋来此落脚的“本地人”，有后来进入丘陵山地“客家人”，还有明代卫所军户形成的“屯堡人”和“穿青人”等。政府主持修建的各地“孔庙”，时间通常晚于佛教道教伊斯兰的寺院。

秦汉精英如司马迁等知道西部草原山地有着“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无

¹ 笔者感谢研究生王海燕为本序言提供初稿资料。

常处，无君长”的部落行国，但除了《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记载的给匈奴当谋臣的“宦者燕人中行说”，极少人想到畜牧游牧生计也能长久绵延，使得2000年后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要为他们操心费力，做生态移民和定居工程。

新中国建立后，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把每个人生活资料配给都跟城乡户籍挂钩。笔者当年要从天津武清的家乡坐火车上北京，也要有县革命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才能买票。而今，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写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确认全国流动人口已经多达2.3亿，超过全球年度跨国流动人口。我们由此可见“中国移动”的广度和深度。

《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设置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分析”报告，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进入国家关注视野。从结构平衡角度看，面对西部开发10年以来民族关系状况频出的状况，国家更应把内地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及其活动的后果纳入研究范围。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流向内地发达地区，固然会给当地的城乡治理带来挑战和创新动力。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常不会在迁入地开发自然资源或启动大规模建设项目，因而也不会引起居民搬迁或扰动家园的事件。相比之下，内地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则往往有资源开发和大规模建设项目及相关活动，对当地居民家园的扰动更大，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开始设立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共建在校园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了履行基地使命，联合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教师团队联合申报了《中国移动因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双向流动的景观、机制、影响和治理需求研究》项目。本项目旨在用民族学人类学方法，揭示当今中国西部开发10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双向流动的机制和治理需求。

云南民族大学王东昕教授、南京大学邵京教授、国家民委政法司沈林处长、中央民族大学潘蛟、良警宇、艾斌教授和侯远高、贾仲益、王晓莉、关凯、朴光星等年轻学者支持了本项目申报。项目负责人在此致谢。项目获准立项后，潘蛟、阿布都热西提、朴光星、张曦和一些研究生团队承担了彝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羌族地区的调查任务并按期提交了成果，为项目结题提供了基础。

项目负责人汇总成果时，看到东京大学海归博士、羌族教师张曦承担的“羌族羌区人口流动案例”跟2008年汶川地震、抗灾和灾民安置关联紧密、时效性强，自成类别，又鉴于张曦博士还要申报其他项目，所以同意他把这部分成果先期出版，同时要求他的团队在本项目结题会后，再做一份更加综合、简明、切要的升级版满足结项需求。张曦感谢同仁善意，并要求海洋写一短序以示承诺。

学术共同体本应互惠互助。海洋愿借此机会介绍张曦博士这份羌族移民研究成果的意义，以此征询各界同仁的批评提点，同时也希望张曦团队再搜集一些资料增加这项成果的覆盖面。

羌族是中国西部最古老，也是被中原王朝最早认知和记录的民族之一。商代甲骨文里已有羌人字样。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讲到“禹生于西羌”，更把羌人流向中原的时间推到古史传说时代。东汉到三国的马援、马腾、马超、姜维都曾依托羌族建功立业。魏晋南北朝时，羌人是入主中原的“五胡”之一。汉藏语系的汉、藏缅、苗瑶和壮侗四大语族里，汉和藏缅语族受惠于羌人羌文化最多。

羌人及其分布地域现有广狭二义。广义羌人是中原王朝用于指代“西方牧羊人”的类别称谓。这里的“羌”字与“炎帝以姜水成”的“姜”字在字形地望上都关联密切。狭义羌人是新中国政府识别承认的民族名称。广义羌区概指青藏高原东北缘到秦岭西段乃至关中平原西北两侧的黄土高原地区，往北还要加上1227年亡于蒙古扩张的西夏王朝地界：东起河套西侧及贺兰山的蒙古高原南缘，西面覆盖整个河西走廊。狭义羌区即今天的羌族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分布区再加上北川羌族自治县。地貌上，它是成都平原西缘的岷山、龙门山和邛崃山之间，以岷江为轴线的陡峭山区。简言之，羌族核心区自吐蕃王朝和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横空出世以来，就稳定扎根在藏、汉、彝、回四大民族之间。

古今羌族的人口和分布地域跟中原内地互补互动此消彼长。先前的陕西宝鸡西面还有过唐武德三年（620年）得地名，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得县名的伏羌县（今名甘谷）。1928年民国政府将伏羌县改回更古老的甘谷县，但同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又把陕南的定远厅更名镇巴县。这类县名说明古代陕西边地

的民族多样性。

羌族和羌区研究在近年有两项重要进展：一是由费孝通、李绍明两代前辈开创的“藏羌彝走廊”综合研究由西南和北京两地学界发扬光大。目前藏羌彝走廊研究不仅产出了丰硕成果，而且衍生出苗疆、武陵山、武夷山等多民族地区的走廊、流域和区域研究。二是王明珂教授经过20年孤身探险，厚积薄发地相继推出《华夏边缘》、《羌在藏汉之间》和《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等“羌族与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三部曲。目前羌族学者对于王教授作为台湾汉人学者写下的三部曲虽然不无异议，但大家都承认他推动本领域研究的功业和贡献出类拔萃。

张曦博士是出生在四川阿坝州理县、成长在南坪和茂县的羌族“六零后”学者。他1986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又东渡日本深造9年专攻人类学，于2006年从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母校任教。他进入羌族研究领域的时间跟前辈王明珂教授依稀相似，至今都有20多年。但张曦博士生长在羌区，家里又有长辈担任羌学会长，搜集资料积累知识的条件更好，可望后来居上。

2008年汶川地震重创羌族核心区。张曦博士当年就引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南京大学语言战略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团队展开羌族文化灾后重建调查，并在次年主编了《持颠扶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一书，展示出少数民族学人强烈的应用研究导向和学术担当意识。

读者手里的这份研究成果，是他承担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移动”项目的新成果。它用民族志方式描述了2008年地震以后，四川省各级政府、各地居民和羌族移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仅用3年就在羌族核心区外围、成都平原上的邛崃市南宝山油榨乡直台村和崇州市济协乡文昌村安置下两个羌族移民村的非凡经历。本书写了羌族社区的生态环境，文化心性和两个迁入地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安置政策、居民包容精神和羌族移民克服困难选择生计重建家园的努力，较好地呈现出羌族移民的主体性和迁入地政府居民对羌族移民的包容性。

邛崃直台行政村是由政府组织的汶川县龙溪乡直台自然村灾民整体搬迁。崇州文昌村由茂县赤不苏乡的灾民利用亲戚关系自愿搬迁。两个移民村搬迁的动机和机制不同，但都是外来移民和当地居民相互体恤重建生活的典范。移民搬迁后就会脱离原有社会网络。他们在新环境下如何适应气候、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场景以重建自己的物质生活并体现文化价值？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

汶川直台村地震后水源枯竭田地尽失，村民靠政府统筹资源迁移到百公里外的邛崃古城乡下。直台搬迁后不仅保留了原有村名，还得到了行政村的地位，形成了汶川地震后，除北川县城之外整体迁村的唯一案例。在中国人多地少，成都平原人满为患寸土寸金的背景下，这样的结果无论对政府、对居民还是对移民，都要经过百般努力才能求得。移民为此付出的经济文化代价也很大，再也不能上山放羊和挖虫草，从长远看还有失去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的风险。羌村移民能否从此落地生根，顺利实现从半农半牧到农耕兼文化旅游的生计转型，进而跟当地居民实现社会文化整合，同时又保持文化认同，固然有待时间检验，但政府、居民和移民三方表现出的合作精神，说明中国农民的素质足以跟市民用同样的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

崇州文昌羌族村的形成靠的是另外一种机制：一位从茂县深山嫁到平原文昌村的羌家媳妇 YXH 调动羌族山民的亲缘、地缘等关系，通过婚嫁、土地租赁、房屋购买等一道道复杂程序，拉拉扯扯陆陆续续地自主搬迁，缓慢地完成了一些山区农户定居成都平原的大挪移。这些移民虽然是自主自愿，但也离不开两地两个民族的移民和村民的双向互动。这样移民的好处是可以充分权衡各种利弊因素，主动承担后果和风险。我们因而预言文昌村羌族移民的发展后效可能更好。本书作者对居民和移民如何在两种文化并存的前提下发展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认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是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共赴前程的不二法门。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祖师杜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时，通常会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把共同体的团结叫“机械团结”而把市民社会的团结叫“有机团结”，从而跟德国社

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里用的“法理社会”与“礼俗社会”弄混淆。笔者目前理解，杜尔干虽然比马克思晚出生40年，又比孙中山早生8年，却跟他们两人一样热情地拥抱工业文明，从而也倾向于把礼俗共同体里的人看成“一条麻袋里的土豆”或“一盘散沙”，进而认为只有基于社会分工构成的人际关系相互有物质需求的关系才是“有机团结”，才会前程无量。这样看来，写《社会分工论》杜尔干显然就有社会发展史的“阶段排他论”倾向。这就使他跟同时代的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下一代的利奇（Edmund Leach, 1910—1989）的“文化生态学”意识拉开了距离。

张曦团队呈现的两个羌族移民村案例表明：人类社会从来都有构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潜力。在汶川地震这种紧急情况下，两种团结都能用集体行动度过危机时间。但要想使生活圆满延续，直台村这种由法理文明社会整体迁移的社区要想使文化传统最终得以延续与发展，通过亲属关系、节日习俗和文化仪式的构建形成礼俗社会是必经之路。文昌村这种靠礼俗文化共同体形成的移民村落迟早也会产生对政府服务的“法理社会”需求。总之，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共同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性两者的存在如同《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里的景颇或克钦贡萨与贡老。人们在不同时代可能侧重构建其中一种，但不会形成一种完全取代另一种的线性进化格局。

笔者认为本项成果还应该补齐三块木桶短板：第一块是羌族灾后移民和灾区重建的整体画面，尤其是北川县城整体迁移的成绩和问题。北川县城搬迁固然是因为老县城曲山镇灾情惨烈情非得已，但它作为温家宝总理始终关注，一次性投资超过百亿人民币，设计规格最高、建成速度最快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搬迁重建工程，显然值得本民族学者关注。况且新县域的基础设施再优越，县城移民也会有着跟农村移民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新县城在国家经济能力最强的2008年抗震高潮中重建，体现了国家经济繁荣时期的优势和能力。但新县域要长久运作，也要居安思危，特别是要规划国家财政紧缩条件下的谋生之道。

二是羌族虽然是处于藏汉之间的人口较少民族，但社会文化观念极为开放，早在地震之前就有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传统，地震后的人口流动规模应该更

大。这项成果从规划本民族长远发展的需求考量，也应对羌族人口在全国的流动分布格局有所呈现。

三是地震之后，当地的基础设施重建和发展援助项目甚多，本项目应该对这些援助建设项目和施工队伍给当地造成的正负面影响有所评估并对今后的改进方向和方式有所总结建议。

这样的研究肯定不能一个项目“毕其功于一役”，但至少应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张路线图。笔者肯定张曦博士主持的这个子项目对于映射“中国移动”的全景画有重要参考作用，同时也希望读者能见微知著，更多地投身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口双向流动的后果及其治理需求研究。

张海洋

2008年12月1日

目 录

序一	丁宏 /1
序二	张海洋 /6

绪 论	张曦 /1
第一节 古羌、羌族及其移动 /1	
第二节 移动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 /6	
第三节 移动的研究及其视角 /10	
第四节 关注移民的人类学视角 /15	
第五节 余论 /21	

第一部分 调查简介

第一章 调查概况	王海燕 虞若愚 /24
第一节 项目缘起 /24	
第二节 关注问题 /2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7	
第四节 项目进展 /29	
第二章 国内外移民研究综述	龙黎 /33
第一节 人口迁移的定义 /33	
第二节 人口迁移的机制 /36	
第三节 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适应研究 /42	
第四节 中国的移民研究 /48	

第二部分
移动的直台村

第三章 移动的羌族村落——直台村 李艳平 /52

第一节 云端的直台村 /52

第二节 艰难的移动 /55

第三节 名称的延续——直台 /60

第四章 搬迁新政策 王亚玲 /63

第一节 土地政策 /63

第二节 房屋分配政策 /66

第三节 地震补偿政策 /70

第四节 直台村的经济生活 /71

第五章 生计方式的转变及适应 王亚玲 /77

第一节 生计方式的变迁 /77

第二节 旅游业的兴起 /91

第三节 小结 /100

第六章 教育现状 王亚玲 /103

第一节 地震之后的直台村教育情况 /103

第二节 本土教育和地方性知识的缺失 /106

第三节 羌语的传承面临挑战 /107

第四节 小结 /108

第七章 文化变迁情况 陈楠 /110

第一节 服饰 /112

第二节 建筑 /115

第三节 饮食 /121